

一) 历史 - 第壹个壹百年

当英国国旗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升起时，香港岛的人口约有 6,000 人，大部分是蜑家渔民及客家烧炭工人，他们散布沿岸的数条贫瘠村落。在数月内，人口急剧上升。从澳门起，沿珠江一带突然冒出商业市集，香港的货仓及码头亦如雨后春笋，散布各处，吸引了大批急于在这新市场做买卖的人涌入。悬挂各国旗帜的船只停泊在海港内。贸易迅速发展，香港这个小镇亦随之兴旺。不多久，酒馆、赌窟、鸦片烟馆和妓院亦在海傍的繁忙商业地带出现。

在英国接管香港两个月后，治安情况令人忧虑。那时海盗活动活跃，¹ 当时并没有具组织性的警察队伍应对有关情况。²

一八四一年四月三十日，以英国公使身份接管香港岛的查理士·义律上尉，委任第二十六步兵团的威廉·坚伟上尉为首席裁判司，肩负起管理警察、法院及监狱的任务。他的 1,400 英镑财政预算，是用来支付他本人和一支由 32 人组成部队的薪金，以及支付一座监狱和多名文职人员的费用。

到了一八四四年，治安情况仍未有大改善，私人雇用的看更提着灯笼在狭窄的街上巡逻，冀以敲铜锣方式吓走邪魔鬼怪及不法之徒，并不见得成功。

一八四四年五月一日，第一条警察条例立法生效，³ 政府在宪报宣布成立殖民地警队，在此之前三年，香港已有临时组织的警队，但到这条法例颁布，才使香港建立起一支独特的纪律部队。当时，成立一个专业的、受薪的执法组织是一个新的构想，伦敦市警队亦祇刚成立十二年。

初期的香港警队管理混乱且欠缺组织性，大部分成员良莠不齐、有华人、欧籍及印籍人士。在通过法例设立警队后不到一年，查理士·梅

¹ Hamilton, S.,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3.

² Hamilton, S.,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

³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7.

理于一八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来港出任警察司，掌管警队，⁴ 对香港警政有重大影响。他以爱尔兰警队的制度为蓝本，建立一支 171 人的警队，在中区、香港仔及偏远的赤柱兴建警署，并尝试招聘质素更好的警察。

查理士·梅理改善了警察的服务条件，包括薪金、长俸及宿舍。可是，招募工作依然困难重重，应聘人员的质素未如理想。及至一八四九年，警队人数仍远低于编制所需，当时香港人口已增至二万人；之后数年间，随着中国发生太平天国叛乱，成千上万人涌入香港，使人口增加差不多一倍。

随着香港日趋繁荣，警队的规模也有所增加，几所警署亦于一八五零年代至一八六零年代期间陆续建成：⁵

位于波斯富街的一号警署（一八五三年）；
位于湾仔道与庄士顿道交界的二楼警署（一八六八年）；
位于皇后大道东的三号警署（一八四七年）；
位于前金钟兵房海军船坞东面的四号警署（一八六三年）；
位于皇后大道中与威灵顿街交界的五号警署（一八五七年）；
位于山顶的六号警署（一八六九年）；
位于皇后大道西与薄扶林道交界的七号警署（一八五八年）；
位于差馆街的八号警署⁶（一八七零年）；以及
位于坚道的九号警署（一八五三年）。

一八六二年，首个「水上警署」（水警的英文名称于一九四八年由 **Water Police** 改为 **Marine Police**，中文名称维持不变）设于港口内。一八六八年，一艘较巨型的三桅帆船「约翰亚当斯号」服役作为水警

⁴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8.

⁵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30 and p. 193.

⁶ 第一所八号警署位于太平山区，于一八七〇年启用，邻近之差馆街及差馆上街均以之命名。太平山区因曾发生鼠疫而需重建，八号警署亦迁至附近的医院道，于一九二五年拆卸。建于高街的第三代的八号警署于一九二八年启用，复于一九三四年拆卸重建，至一九三五年底落成启用，是为第四代的八号警署。八号警署曾成为港岛总区刑事总部，现在已改为戴麟趾康复中心。

总部。十六年后，即于一八八四年，一所新水警警署在尖沙咀落成。一八七零年代中期，新警署亦陆续于油麻地，红磡及筲箕湾落成。⁷

梅理一直担任警察司，一八六二年升任为警察裁判司，他的岗位由威廉·甘贤接任。梅理就任十七年间建立了一个警队架构，稍为遏止海盗、三合会会员和匪徒的活动，为这个迅速发展城市的挤迫街道带来一定程度稳定和安全。

这时候，市民的安全仍然受到威胁。到了一八六二年，香港的人口已达 12 万，而英国已取得九龙半岛的南端，晚上在街上行走仍是危险，就算在家里，居民仍然担心夜盗光顾。当局重组警队，实施严明纪律，从孟买本地步兵团聘请退役军人，并全面增加警察薪金，提高士气和工作表现。一八六七年警队人数增至近六百人，近三分之二为印度裔警员。

一八六六年七月，威廉·甘贤的接任人华尔特·甸尼获任命为警察司。作为能操广东话的少数英国官员之一，甸尼认为应有更多人员能具备双语能力，他期望警队每一成员除母语外还能学习多一种语言，⁸ 因而在一八六九年十月设立第一所警察语言学校。当时的学校主管爱德华·威科克斯，安排来自欧洲、印度及华籍的警队成员和在监狱工作的人员于晚间上课，报读有关课程属自愿性质。但到一八七二年，所有驻守中区，或在中环军营(警察语言学校之所在地)附近驻守的人员，均须参与课程。

到了一八七零年代，警队已得到革新，并有效运作。警队已清除腐败和无能分子，聘用更多华人，及从爱丁堡警队招聘一些健壮的苏格兰人到港服务。罪案数字大幅下降，一八六六年有 384 人被判「在公路上打劫」罪，这惊人数字在一八七六年减少至 24 人。此外，谋杀及海上掠劫的数字亦下降。

在动乱的时代，这是一段罕有的平静时期。不久，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期间，太平军叛变席卷中国，在香港的分支也震动整个香港。三合会利用政治动乱进行犯罪活动以获取利益，往后香港出现危难的时候，三合会每每以同样姿态出现。

⁷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59.

⁸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52.

在一八九三年，33 岁的梅含理出掌警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有多位爱尔兰人先后掌管警队，而梅含理是其中一个。梅含理的获委任，对警队带来深远影响。梅含理于一八九四年带领警队人员处理太平山的瘟疫时，充分展现领导才能和服务香港的奉献精神。他身先士卒，亲自监督令人厌恶和危险的任务，例如监督埋葬尸体，疏散群众和拆卸受影响的建筑物等。⁹ 梅含理不但掌管警队，他还掌管消防工作、管理监狱、出席市政局的前身组织，同时亦是一位活跃的立法局议员，后来更成为香港总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对他之前曾协助改革和强化的警队，一直非常关注。

在一八九八年六月，英国向中国租借新界，为期九十九年。当时新界区的民居主要集中于屏山、上水、沙头角、大埔、西贡及大澳。一八九九年至一九零二年期间，这些地方陆续建成首批永久警署。¹⁰ 新警署建于民居附近较高点和具防御能力，每间警署编制人数为 20 至 40 名警员。第一所警署为大埔警署，于一八九九年建成。¹¹ 为了应付警务工作需求，警队额外招募 300 名人员。¹²

随着满清皇朝于一九一一年覆亡，境内有更多海盗和抢劫活动发生。一九一二年，长洲警署被海盗突袭，三名印度警员遭杀害，枪械及约 1,000 元土地租金和港务费被盗。其后，一所新的长洲警署落成，直到今天仍在使用。¹³ 另一宗袭击事件发生于一九一四年，当时一艘重 438 吨的内河轮船「泰安」号上有超过 200 人死于枪击、火灾或遇溺。「泰安」号事件乃发生在珠三角一带最严重的海盗事件。同年，政府颁布新的防止海盗条例。¹⁴

⁹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86.

¹⁰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94.

¹¹ 到目前为止，四所当时建成的警察建筑物仍然存在，包括(1)旧大埔警署于二零零七年空置，其后被发展成「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2)旧上水警署于一九七八年被取代，随后自二零零六年起用作「少年警讯」会所；(3)旧屏山警署改建为「屏山邓氏文物馆」，目前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运作；及(4)旧大澳警署于二零一二年被翻新为精品酒店。

¹²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96.

¹³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01.

¹⁴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03-104.

二十世纪带来了希望。这时候，贸易不断增长。但在一八九零年代却发生了可怕的疫症，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当时的警察曾英勇拯救疫症患者。随后，学校、医院和银行在各地林立。其时，中国的改革风雨欲来，如台风般打击香港，这种打击以前曾经出现，往后亦经常出现。

民族主义的高涨，导致清朝在一九一一年覆亡，中华民国诞生，在此同时，亦带来了动乱。当时军阀横行，割据土地，动荡的局势促使一批批新移民越过深圳河，如潮水般汹涌而至。而在香港，则发生罢工和杯葛事件，引起很大不安。维持治安的警队，在动乱中自然首当其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外籍警官离港参军，其中十人在西线战事中阵亡，其他许多人再没有返回香港。在这段期间，政府召集平民加入警队，共有 352 人经过宣誓仪式，被委任为特别警察，组成特别后备警察队伍，并依其国籍，分别编成英印籍、华籍与葡籍三个大队。他们成为工作繁重的正规部队的有力后援，亦开始了一个卓越的服务传统。

为了加强警力，警队在遥远的山东省招募人手，在山东省威海卫港口签订雇用合约。他们体魄健硕，备受重用。由政治因素所激发的斗争在全港造成紧张局面，而有人更恐吓会伤害拒绝参加罢工的工人，使情况更形恶劣，警方遂成立了一支特别的警察队，以保护那些想上班的工人。而在海上，亦出现麻烦；海盗和劫船者的活动十分猖獗，警队于是在近岸航行的船只上派驻一支主要由白俄罗斯人组成的特别队伍，以防止海上掠劫事件。

战后香港暴力罪案增加，还发生多次罢工，及至一九二二年爆发了「海员大罢工」，三年后更发生了「省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三月，新的刑事侦缉处宣告成立，内设劳工保护课，负责处理「大罢工」的工作，专门对付威吓欺凌工人的不法分子。由于警方有效遏止这些恐吓活动，支持罢工的人数逐渐减少。

一九二零和二零年代，香港经历了社会和政治的快速变化。警队继续与时俱进，人口亦稳步增长。罢工期间，已在战后解散的特别后备警察队伍宣告重组，成立了华籍及非华籍两支队伍，以维持社会稳定。两年后，该支队伍改为较固定性质，称为后备警察队，也就是现在辅助警察队的前身。在一九二七年，第一支冲锋队成立并在港岛运作，

以应付小型骚动、严重罪案及天灾。新警署亦于油麻地、旺角、沙田、深水埗、九龙城、半山区、湾仔及打鼓岭陆续建成。¹⁵

一九三四年，经·亨利掌管警队担任警察总监，其后由于警队首长的名称有所改变，经·亨利在一九三八年成为警队第一位警务处处长。他曾致力推动成立刑事侦缉处，并于一九二三年出任该处处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肩负起领导警队的重任。

在整个一九三零年代，在香港华人社会曾出现因反日情绪而引发的一些群众事件。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发生，当时日本军队占据满洲，华人社会的反日情绪升温，一连串公众秩序事件在香港不同地方发生。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的「七七事变」标志日军全面侵略中国及中国人民抵抗战争的开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斗全面展开，香港也于一九四一年沦陷。¹⁶

约翰·俞允时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履任警务处处长，见证着日军的侵略。当日军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越过香港边境后，造成非常混乱的局面。当时盟军及香港义勇军在前线与敌军战斗，而警队则奋力在惊慌的人群中维持秩序、遏止抢掠事件和保护市民大众。位于中区警署的警察总部备受敌军大炮攻击及战机空袭，造成不少伤亡及破坏，所有人员被迫撤往早已挤满难民的告罗士打酒店。四名警员则在鲗鱼涌支援英印士兵共同抵御日军进犯时阵亡。另外还有两人在港岛其他地方的战斗中殉职。¹⁷ 在香港沦陷期间，共有 **87** 名正规或后备警务人员失去生命。

经过与日军 **18** 天的激战后，当时的港督杨慕琦爵士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向日军投降，日军正式占领香港。外籍警务人员全被送到集中营囚禁，有些突然离世，有些则在营中度过漫长岁月，而华籍和印籍的人员则被允许留在被占领的香港。许多华籍警察设法离开香港，逃到中国还未被占领的地方，而另一些则为日本政府在占领期间工作。有些警务人员则失了踪，之后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其命运如何，亦无人知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

¹⁵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95.

¹⁶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28.

¹⁷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p. 175.



拆卸前位于波斯富街的一号警署



一九三二年启用的湾仔警署



位于西区的第二(右方)及第三代(左方)七号警署



中央警署内的「巴叻楼」，摄于约一九五〇年代后期

参考文献：

1. Crisswell, C. and Watson, M. *The Royal Hong Kong Police, 1841-1945*. Hong Kong: Macmillan, 1982.
2. Hamilton, S.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冼乐嘉。《皇家香港警察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1844-1994》。香港：皇家香港警察队警察公共关系科，1994。